

23 20

晃寧

文史

紀念晃寧解放五十周年專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晃寧縣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第九輯

冕宁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九辑

纪念冕宁解放五十周年专辑

主 编：赵剑生

编 委：古荣华

王德忠

邓明发

王大钊

封面设计：肖雅兰

冕宁县委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冕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八日

序

冕宁县政协副主席 赵剑生

五十年前，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南北挺进西昌、大凉山。国民党军队狼狈逃窜。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冕宁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解放大军进入冕宁县城，冕宁解放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县的形势也和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回顾五十年历史，解放前夕暴风骤雨式的斗争，解放了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欣喜，如火如荼的合作化运动，引为反思的公社化浮夸风，文革时期的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改革开放经济的飞速发展……一幕幕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幸生长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亲历了这一场历史的巨变。五十年辉煌，我国由弱小变得强大，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各民族空前团结，国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古老文明的中国青春焕发。尽管历史的道路不会平坦，前进的历程不会一帆风顺，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将克服重重困难，昂首阔步前进在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更强大！

为纪念冕宁解放五十周年，政协文史委特编辑文史资料第九辑，以“纪念冕宁解放五十周年，反映冕宁五十年建设成就”为主题，本辑文史资料选编稿由两部份组成。第一部

份以解放前后为历史背景，一些老同志的回忆，他们亲身经历真实地再现了临解放初期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二部份为冕宁一些单位、一些部门的发展历程和业绩，他们的发展可见冕宁经济之一斑。

本专辑得到解放冕宁时南下解放军留冕老战士，冕宁地下党老同志的热情关怀，他们不顾年迈，积极撰稿，丰富了专辑内容。各有关单位和个人义务投稿为本辑提供了大量素材和稿件。我谨代表政协文史委和本辑编委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因篇幅及本辑内容所限，部分稿件今后将陆续选用，以前八辑选用过内容相似的稿件未使用，特作说明并向作者致歉。

水平所限、经验不足，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目 录

王月生在冕宁	王家国 (1)
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唐孟侯 (8)
金江第二纵队	王正才、王家国 (15)
智取武器	王兴礼 (21)
抗丁	廖志源 (23)
铲烟	王兴礼 (23)
打进去 抓枪枝	张举植 (29)
计擒汪宪民	张举植 (32)
后山政工处工作片断	王用国 (35)
参加地下党投身革命	饶定民、王家国 (38)
做地下党的医生	王家国 (43)
从省师校到政工处和群力合作社	张永林 (48)
革命往事回忆	廖万金 (52)
西昌战役解放军冕山误会战采访记	马文中 (56)
当年的红军回来了	马文中 (62)
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剪影	湛作国 (68)
第二故乡——冕宁	杜乐忠、王大剑 (71)
解放初第四区工作简况	许维纲 (81)
第五区工作锁记	邓显镛 (86)
中共宏模乡优胜村党组织发展简历	张举植 (90)
第二战场	湛作国 (104)
五十年代的干部作风	古荣华 (109)
泸沽区民改平叛回眸	邓天禄 (114)

购物票证随想录·····	单礼忠(122)
长征路上的一颗师范明珠·····	王大平、李良彬(127)
为国育才 共铸辉煌·····	高 泓(136)
冕宁民族中学·····	沈木呷、彭木三(142)
负重前进的冕宁二中·····	池启芬(149)
冕宁通信跨世纪的飞跃·····	唐 勇(156)
冕宁交通发展记实·····	李 健(165)
冕宁县水泥工业发展历程·····	杨永康(170)
冕宁科技进步一睹·····	徐小红(175)
彝乡之光·····	池启芬(177)
飞速发展的乡镇企业·····	陈建明(185)
冕宁县计划生育工作概况·····	马晓奇(204)
天翻地覆五十载 人民卫生展新貌·····	徐家源(210)
前进中的四川安宁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余晓红(223)
泸沽旧貌换新颜·····	湛作国(234)
复兴新貌·····	孙占国、赵正一(242)
冕宁县沼气 省柴灶的推广运用·····	罗兴富(245)

王月生在冕宁

王家国

王月生同志是原中共西昌地下党工委委员、兼冕宁地下党县委书记，从1946年底到1950年3月，他亲自领导冕宁全县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49年2—6月、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底，地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两次离开西昌期间，西昌、会理的同志们向他汇报请示工作，他也尽力给予指导和帮助，承担工委成员对全地区工作应尽的领导责任。峥嵘岁月，事迹繁多，本文谨就我个人亲见亲闻和经历的事实，作一些简要的叙述。

王月生同志原名乐崇礼，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即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2年初夏，由中共川康地下特委派遣，作为中共四川地下党西昌地区平行组织成员，到西昌地区先后在宁南、西昌等地工作，后平行组织因故不复存在，王月生同志的组织关系转归中共西昌地下党。1946年底王月生受西昌地下党组织负责同志黄觉庵派遣到冕宁县负责工作。

王月生同志到冕宁后，根据上级地下党组织原来掌握的情况和他自己的实际了解，决定由三位三十年代入党，工作表现较好的老同志邓明鸿、王仕汉、严伯通（1949年增补廖志达）组成中共冕宁地下特别支部，邓明鸿任特支书记，王

月生负责党的全面工作，按时参加特支会议，对特支作具体领导并作相应的决议。特支当时涉及全县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地下县委成立后，特支仍然保留，主要负责党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工作。在几年的实际斗争中，王月生和特支三个成员成了亲密的战友。特支为冕宁人民的解放事业，确实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当时公开的社会职务，邓明鸿是县财委主任，王仕汉是石龙镇副镇长，严伯通是宏模乡乡长）。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和尽快熟悉地方情况，王月生初到冕宁，住在宏模乡，并由严伯通出面，在该乡的腊拉白村创办一所彝民小学，王月生同志就在该校任教师。由于该村是彝族聚居区，又毗邻汉区，既方便，又安全，并能及时了解许多情况，后来就在当地和附近彝汉人民的进步青年中培养和发展的首批地下党员，并由此推及全县。

1947年春，西昌地下党负责同志黄觉庵派王月生到成都向中共川康地下特委汇报请示工作，当时虽然交通不便，跋涉艰苦，事关重大，王月生同志坚决勇敢地接受派遣并圆满地完成任务。在成都、川康地下特委对西昌地区的工作做了全面指示：①成立中共西昌地方工作委员会，黄觉庵任书记，王月生、李成英为委员。西昌地区工作划分为西昌、冕宁、会理三个点，黄觉庵负责西昌点的工作，调王月生去冕宁负责，会理由龚成林负责；②要在农村和少数民族中发展党的组织；③开展并加强乡镇两面政权的工作；④开展武装斗争，决定武装斗争番号为“川康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王月生同志返回西昌，向黄觉庵同志传达了川康地下特委的指示。回冕宁后，又向冕宁地下特支成员作了传达，并在实际工作上坚决贯彻执行。

冕宁地下党从1941年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奉命隐蔽，长期处于埋伏状态。原有十几个党员，分住各地，从事各种社会工作，没有进行组织活动，更没有发展组织，上级也没有派人和他们联系。这次川康地下特委的指示，给予王月生和冕宁地下党同志们巨大的精神力量；王月生同志分别和原有的地下党员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又向几位没有担任社会主要职务的老同志金发第、吴志刚、李祥云、陈言纶等布置了在农民和少数民族中发展组织的任务。地下党的建设，很快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县绝大部分地区逐步展开。

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首先是在农民（包括少数工人）和少数民族中积极慎重地选择和培养了大批建党对象。并分别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阶级教育、宗旨教育、气节教育，有条件的还适当阅读文件，对其中有入党要求的积极分子，都进行必要的锻炼和考察，在条件基本成熟的时候，由地下党派出的负责同志分别接收，个别履行入党手续。对一些知识分子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中上层人士入党，则由王月生同志接收，从而保证党员质量。从1947年下半年起，地下党的组织在全县日益发展壮大，到1950年3月解放时止，冕宁地下党共有党员600余人，其中出身于工人、贫苦农民的约占85%，青年学生、中小学教师和其他成份的党员约占11%，少数民族（彝）党员约占4%。三年中，相继建立二十几个支部，四个区委。1949年5月，成立中共冕宁地下县委，王月生兼任县委书记，李祥云、金发第、吴志刚、刘若愚为县委委员。总的看来，冕宁地下党组织的发展，行动快，数量多，质量好，特别是在彝族人民中发展了二十几名共产党员，为后来的迎接解放和开辟全地区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

献。

随着地下党组织的发展，两面政权的工作也进一步加强，到1949年，从县级各部门到乡保各单位，相当一部分都由我地下党员主持工作，对少数没有地下党员任职的边远地区，也由当地一些进步青年和开明人士担任领导。虽然地下党当时是不公开的，但是党是人民群众的希望所在，党在冕宁是基本上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例如1949年秋，冕宁人民对当时的县长叶大廉举行大会检举清算，之后又拒绝有贪污劣迹的新县长金国才上任（史料称“检叶拒金”运动），就是冕宁地下党决议后，由王月生同志具体指挥县参议会驻会委员、共产党员王仕汉、严载衡等同志，运用县参议会的“合法”斗争形式，组织全县人民打击一个县的政府首脑的活动。通过这样一些工作，使当时属于国民党统治区的冕宁县的各级政权机构，逐步形成瘫痪或有名无实状态。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我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冕宁地下党的力量强大了，除加强对县内一切民主进步人士的团结合作以外，还根据冕宁实际，对邓家靖边司令部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当时的靖边司令部是一个强大的反动武装集团，1944年邓秀廷死后，其妻邓吕仙和其子邓德亮继续保持他的势力，盘踞在甘相营和泸沽一带，其势力远及越西、西昌等地。冕宁地下党对邓家一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在1949年“孙、邓事件”中，为共同反对西昌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与邓家一度结成统一战线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孙、邓事件”，表面是邓德亮和孙子文争当靖边部司令的斗争，但孙的后台是国民党西昌警备部贺国光的主力

西康省政府刘文辉西昌驻军的一部。邓家不甘示弱，要求冕宁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冕宁地下党因势利导，派邓明鸿同志以冕宁自卫队名义率领一营参加邓家队伍，把孙邓争权的斗争转化为冕宁人民反对西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当时，邓明鸿打入邓家靖边部，任主任参谋兼营长，实际常在司令部为邓家策划训练干部、调集新兵、筹备粮饷等等。邓德亮的亲舅父吕世钧，思想较进步，时任邓家靖边部参谋长，这样，邓明鸿和吕世钧便成了孙邓武装斗争中为邓家出谋划策的主要人物。吕世钧曾向邓明鸿说：要派人去云南找共产党，并同意减租减息。邓明鸿向吕说：到处都有共产党，何必要到云南去找哩！在中共冕宁地下特支开会时，邓明鸿汇报了上述情况。特支研究决定，可以介绍吕世钧加入地下民主同盟。经邓明鸿做好工作后，王月生同志到泸沽亲自接收吕世钧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并讲明民主同盟是共产党领导的。吕世钧当时感到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信任，更加信赖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而加强了我地下党和邓家靖边部在政治上军事上结成统一战线关系。之后，邓明鸿在决定一些重大问题，如向大户借粮，创办后山政工处等等，使邓家做到言听计从，这与吕世钧对邓明鸿的支持、配合是分不开的。（解放后，吕世钧曾任越西县长）。

1949年夏季创办的后山政工处训练班，利用邓家靖边部名义，完全是冕宁地下党为培训党的干部采取的重要措施。当时党组织任命地下党员严载衡任政工处长兼训练班校长，但实际总策划和总领导是王月生同志，王月生同志当时不仅掌握冕宁地下党的全局，还定时为政工处训练班讲课。训练班共办了三期，培训了一批党员干部和一部分建党对象约220

人。通过培训，全县地下党的理论水平和战斗力都大大提高了。

《战斗通讯》是冕宁地下党的重要宣传工具。党指定专人负责收音、记录、刻写，王月生同志亲自审稿、编辑，虽然是油印小报，但内容都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是全县地下党员学习的重要材料，在当时全县地下党员中起到了明确方向、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巨大作用。特别是编印过一期《民族问题专号》，由瓦扎木基同志译成彝文，用汉彝文对照形式印发冕宁、喜德、越西、西昌、会理等广大彝族地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政治影响较大。

“孙、邓事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最后双方妥协停战了。但在这场武装斗争中，冕宁地下党经受了锻炼，培训了干部，组织了群众，还粉碎了敌人妄图进攻后山政工处的罪恶阴谋。王月生同志和特支的同志自始至终领导了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保持了冕宁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949年冬，冕宁地下县委还就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划分为七个武装游击支队，第一支队长邓明鸿、第二支队长严伯通、第三支队长陈颂三、第四支队长陆子厚、第五支队长罗志清（彝）、第六支队长伍文才（彝）、第七直属支队长瓦扎木基（彝），为迎接解放作出组织准备和全面部署。

王月生同志身为西昌地工委委员，平时主要是负责冕宁地下党的全面工作。在1949年至1950年3月，地工委书记黄觉庵因故两次离开西昌期间，西昌县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因和王月生有过组织关系，便在工作上经常联系，向王请示工作，会理县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原来与王月生没有组织关系，但通过西昌搞联络的同志介绍也找到冕宁来，王月生对西

昌、会理来的同志，都是热情接待，尽力帮助，解决工作上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尽到一个地工委委员对全地区工作应尽的领导责任（会理地下党还为冕宁调来四个干部）。

王月生同志在冕宁的时间，距今已五十多年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跟地下党时期已大大不同了，但党的性质、目的、宗旨和组织原则是不会改变的。建国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些党的领导者，不研究党的历史，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原地下党的许多同志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和不公正的对待。王月生同志本人和原冕宁地下特支的邓明鸿、严伯通等同志也受到极大的诬陷和错误的处理。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泛滥，对整个地下党更是颠倒是非，完全否定，这是极不应该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全面的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原地下党许多蒙冤的同志终于得到平反昭雪。应该说：冕宁地下党在领导冕宁人民解放斗争中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王月生同志当年在冕宁所表现出的勇敢、机智、顽强的革命精神，冕宁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让我们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党在冕宁地下时期的革命精神，把党的工作做得更好，把冕宁建设得更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日

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

唐孟侯

1948年秋，我在西昌国立西昌技专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在1949年夏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北，渡江南下和进军大西南之际，为了迎接祖国大西南——西昌的最后解放。西昌技专地下党组织，接受了党的战斗部署，纷纷离开了学校。一部分奔向会理县境，组织金江上游武装支队，另一部分奔赴冕宁党员集中地开展解放西昌的地下工作。

烈火中锻炼

我同陈代廷同志接受地下党组织派遣到冕宁宏模与金发第同志接头。为了不暴露身份，有利工作，我化名为唐孟侯（本名唐自卫），陈琮同志化名为陈代廷。我俩到达宏模指定地点顺利地与地下党组织接上关系。中共冕宁地下县委初安排我二人去文家屯谢和生家任家庭教师作掩护，后又转移至文蔚小学教书。在此认识了西昌籍童光敏、肖祖惠和冕宁赵涤生等同志。这时西昌地工委黄觉庵同志交金发第带回一部收音机来文蔚小学。1949年10月1日晚，我们收到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以及国歌、国徽和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徐徐升

起的特大喜讯，它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党员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群众的胜利信心。在文蔚小学我们还看到了中共甯宁地下县委创办的地下刊物——《战斗通讯》，以及印发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改革大纲》等光辉文献。不久地下县委决定调陈代廷和我分别去复兴、石龙两镇中心小学任教。

教《国歌》迎解放

我到石龙中心小学担任两个班的数学、体育等课。那时王月生同志多次来校了解情况和指导工作，同桌吃饭，都以王先生相称，他曾指示我们：“要把有条件的学校办成宣传革命思想，组织革命力量的阵地”。明确了任务，教书要注重对学生革命思想的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学校的吴绍棣（校长）、金国忠（教导）、古荣华、王家国、王用国、陶元璋等老师都是一批地下党员，我们在校相处较好，革命目标一致，使我心中明朗，工作大胆起来。

接着，是我任课班的同学要我教歌，我向学校领导反映了，要我大胆去教。但教什么歌呢？我正思考中，就想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五星红旗已在解放区飘扬，抗日战歌《义勇军进行曲》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甯宁即将解放前夕，对学生教唱国歌不正是意味着迎接解放吗？为解放而作准备吗？我想不如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和《保卫黄河》这三首抗日歌曲同时教唱，既可避免反动当局的追查，更能宣传革命思想，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于是我就在学生中教了这三首革命歌曲。此外，王强国等老师也在石小教了《游击队歌》和《解

放区的天》等革命歌曲。这些歌曲不仅在校园教室、球场活动和放学集合中唱，也在早操公路上唱。它不但丰富了学校的文化生活，也激励起革命者的斗志，使反动派胆颤心惊！

为了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还联系抗日歌曲内涵讲：过去唱它，是为了团结起来，拯救我们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凶恶的敌人，它强占了中国领土，烧毁了无数家园，残杀和蹂躏了我们千百万同胞，奸淫中国无数妇女。我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不当亡国奴，共产党八路军在最前沿领导人民英勇杀敌，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我们现在唱它，是为了继承和发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因为中国反动派为了推行法西斯统治，不顾人民的死活，又全面发动内战，强行向人民派丁、派粮、派款，它借口禁烟，实则大收烟款，人民饥寒交迫，灾难重重；而反动派至今仍不放下屠刀，人民处于水火之中，为了人民的生存，不再当奴隶，只有觉醒起来进行斗争，才能解放自己。由于学校不断灌输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迪，焕发出革命热情，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对反动派充满仇恨。记得有天刚放学，有两个学生跑回学校向我报告：说他们正走在公路上，就遇到国民党两个兵问：你们学校有没有姓唐的老师？我们看他俩不是好人，就回答他：没有。等这两个兵走远了，才跑回来告诉你，唐老师要注意啊！我对学生说：你两个做得对，我注意就是了，快回去吃饭吧！又一次，我在楼上教室上课，而楼下教室的同学发现金国藩窜入我寝室。在我桌上、铺上慌张的找东西（因我待阅的文件退了）结果未找到任何东西走了，课后我回寝室，学生都来详

尽给我讲了。过了半月，金再次来找到我，他要我介绍他参加地下党，这时我乘机警告他。我说：你不是在我桌上、铺上找了一次，你看我究竟是不是地下党？有何根据？告诉你，我是来此教书的，不信你去问学校和学生嘛！我至今还不知道地下党在哪里，你肯定找错门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无从回答，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再不来了。解放后，我在西昌公安处工作，从冕宁报批镇反案件中，我看到他是本地隐藏下的特务，在河边乡煽动抢粮被第一批镇压了。

护送情报

我在石小教书不久，金发第同志来校要我担任地下县委交通员。他向我交待：这条地下交通线十分重要，由西昌南下至云南，北上至礼州、松林（包括沙坝）、石龙、宏模沿途设站。松林至礼州由裕隆河心李廷玉负责；松林至石龙由刘善兴、刘寿兴负责；石龙至宏模由你（指本人）负责；情报直接交王月生和我亲收。金发第说地下交通线任务，是确保地下党的情报畅通，工作中绝不能发生差错与失误；只限本人知道，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组织和自己身份。他交待任务后，我自知情报工作的份量，没有推卸，感到是件光荣的使命。我向他讲：“保证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特别是后来学校放了寒假，那时学校只有我和煮饭的王大伯两个食宿在校，其余老师都回家了，后来王强国老师关心我，常在夜间来校打伴，同时交换学习马列主义心得。他为了我的安全，将家中手枪一只借我使用（后交组织了）。在寒假中，金发第同志有时深夜由西昌返冕宁途中来校同宿，并向我转告有关云南昆明和省内外、西昌等地的消息，使我深受鼓